

刘正刚 黄国信 主编

海屋集

——黄启臣教授八十华诞暨治史六十年纪念文集

施亮题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刘正刚 黄国信 主编

海屋集

——黄启臣教授八十华诞暨治史六十年纪念文集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屋集：黄启臣教授八十华诞暨治史六十年纪念文集/刘正刚，黄国信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3

ISBN 978 - 7 - 218 - 11693 - 8

I. ①海… II. ①刘… ②黄…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1800 号

海屋集：黄启臣教授八十华诞暨治史六十年纪念文集

刘正刚、黄国信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责任编辑：余小华 钱 丰

责任技编：周 杰 吴彦斌

封面题字：龙志航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珠海市鹏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28 插 页：2 字 数：45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 83781421



2007年，曾指导过的研究生为纪念文集教授70华诞祝寿。前排右起：黄海妍、
庞秀声、黄启臣、熊燕；后排右起：温春来、黄国信、刘正刚、李庆奎、鲍炜



2007年，纪念文集教授挚友、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袁清（Tsing yuan）来中山大学访问。适逢两人年届70华诞，袁教授设宴祝寿留影，右起：袁丁、程焕文、胡守为、袁清、黄启臣、庞秀声

序

杨国桢

黄启臣教授八秩华诞之际，门生好友为他编了这本纪念文集，以为庆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和启臣兄相识于1982年。记得那年10月，我陪傅衣凌师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学术讨论会，启臣兄在会上发表试论明清商业资本流向土地的问题。他是著名中国社会经济史家梁方仲先生的研究生，当时才从广西调回中山大学历史系工作不久。以后交往渐多，他曾多次应邀到厦门大学开会，参加我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调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乃至退休之后，也未中断联系，屡赠大作，至今三十多个年头了。

明清社会经济史是启臣兄研究的重点。他于1960年代跟随梁方仲教授学习明清经济史，先从一个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钢铁生产为突破点，选择生产领域为切入点，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揭示中国钢铁生产发展的原因，分析了钢铁生产中的官营管理体制和民营管理体制，注意钢铁生产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于1989年改题为《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受到同行专家的赞许。此后，他专注于明清广东商人和商业以及商品经济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货殖华洋的粤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等书。与人合编合著了《广州外贸史》（上、中、下）（广州出版社，1995年）、《广东海上丝绸之

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3 年, 2014 年修订本再版)、《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广州十三行之一: 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年)、《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2006 年) 等。

启臣兄的澳门史研究, 使他成为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他就开始了澳门史的研究。澳门的历史是明中叶以后海外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 与他从事的明清经济史有紧密关系, 将两者融会贯通, 不仅大大拓展了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领域, 而且开拓了以澳门为载体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填补了澳门这一研究的空白。他不辞辛苦, 先后到澳门、香港和国内各地的数十家图书馆、档案馆收集澳门历史的原始资料, 并就澳门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撰写相关论著, 至今已发表关于澳门历史有关的论文 50 余篇, 出版了《澳门港史资料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中外学者论澳门历史》(澳门基金会, 1995 年)、《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 1994 年)、《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 1994 年)、《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 年)》(澳门历史学会, 1995 年) 等鸿著。在此基础上, 完成《澳门通史(远古—1998 年)》(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一书, 作为澳门回归的献礼。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翔实阐述澳门历史发展过程,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专著。

启臣兄著作等身, 出版著作 30 部, 发表论文 190 多篇。他的敬业精神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敬祝他健康长寿! 阖家幸福!

2017 年 1 月 31 日于厦门会展南二里 52 号九楼寓所

目 录

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	黄启臣 / 1
明思宗为何成为亡国之君	陈梧桐 / 25
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	李根蟠 / 51
17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 Hambuan 文书试探	杨国桢 / 94
“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景泰、天顺年间赈灾助饷 为中心	方志远 / 133
相会在星空：十五至十七世纪东西方的航海天文	陈忠烈 / 162
清代广州十三行与茶叶之路	冷东 / 182
历史叙述与社会事实：珠江三角洲族谱的历史解读	刘志伟 / 209
聚落型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	陈春声 肖文评 / 233
秦汉环境保护初探	倪根金 / 265
地方主导与制度转型：明中后期海外贸易管理体制演变及其区域 特色	李庆新 / 282
盐法变革、商业繁荣与国家和市场的新型关系研究——基于明代财政体系 演变的考察	黄国信 / 303
明代广东仕宦形塑庄氏烈女形象研究	刘正刚 / 324

国家祭祀与地方秩序构建中的互动：以伏波神信仰地理为例

..... 王元林 / 344

风从广州来：18—19世纪广州外销成扇——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

成扇为例 黄海妍 / 372

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以16—18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

..... 黄志繁 / 395

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Stevan Harrell）对话

..... 温春来 / 413

恒山亭与天福宫：新加坡早期华人的信仰与社会 陈永升 / 430

附：黄启臣教授已出版著作一览表 / 438

后记 / 440

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

中山大学 黄启臣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清代前期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海外贸易微不足道，甚至比不上宋、明两朝。我们认为，这种见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实际上，在清代前期的一百九十六年中，只有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海禁，康熙五十六年至雍正五年实行了部分地区海禁，总计不过三十九年，其余一百五十七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即使在禁海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是实行一条闭关锁国政策，它实行的乃是开海设关、严格管理贸易的政策，海外贸易额比宋、明两朝是有发展的。本文拟就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政策、发展状况和管理制度作一探索。

—

满洲贵族入关伊始，承袭了明末的贸易制度，对沿海人民出海经商，并无明文禁止。后来，为了对付占据东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势力，迫使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就范，于顺治十二年、十三年及康熙元年、四年、十四年五次颁布禁海令^①；顺治十七年及康熙元年、十七年三次下达“迁海令”^②，企图断绝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〇，第1页；卷六九二，第1页；卷七七六，第3页。

② 《东华录》顺治十七年九月癸亥条；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丙辰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第3页。

大陆人民对台湾郑成功的支援，禁止沿海居民出海经商。但对于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则不在禁止之列。尽管如此，这种落后的海禁政策既严重阻碍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给沿海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因此，朝廷的官僚大臣和地方督抚们，对海禁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以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直隶巡抚李光地等为代表的守旧大臣，坚决拥护和主张禁海。他们认为，宁可少要一些钱，也不能和外国贸易，以免引起不虞。其他一些大臣，特别是闽、粤、浙、苏各省的地方官吏，却竭力反对禁海，主张开海贸易。康熙十五年始，江苏巡抚慕天颜，福建总督范承谟、巡抚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桢及监察御史李清芳，工科给事中丁泰等，不断向清帝上疏，反映实行海禁所造成的经济衰败、财政困难、百姓失业和铸铜枯竭的情况，认为只有开海禁贸易才能解决“谷贱伤农”、“赋税日缺、国用不足”和铸铜“匮乏”等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①。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了台湾，三藩之乱又已平息，为废除海禁创造了条件。又鉴于主张开海贸易的人越来越多，康熙皇帝顺乎时势，支持了慕天颜等人开海贸易的主张，指出：“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②他令群臣就开海贸易的问题进行商议，诸大臣一致认为：“今海外平定，台湾、澎湖设立官兵驻扎，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③。康熙皇帝不仅同意这种意见，而且进一步发挥开海贸易的好处说：“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裕，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④于是，康熙二十三年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俱同一体，应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⑤第二年，宣布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并分别设立江海关、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第一四页；江日昇：《台湾外纪》卷六。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籴》。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籴》。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第18页。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籴》。

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等四个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①。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至此，清初的海禁宣告结束，中国的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开海设关管理的时期，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年，长达一百五十六年。

在此期间，虽然有十年的南洋海禁，但这与前次海禁不大相同。这时“内地商船，东洋（日本）行走犹可，……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②，说明只是部分禁海而已。即使如此，也同样受到开明官员和反禁派的激烈反对。广东、福建的地方官员纷纷“请弛其禁”^③，认为“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其利甚为不小”^④。雍正五年，宣布废除南洋禁海令。从此以后再没有实行过海禁，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不过，由于“掠夺、谋害及经常诉诸武力，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开始贸易的特色”^⑤。乾隆二十年发生了英国侵略分子洪任辉（James Flint）驾船闯入宁波、定海和天津的事件，清政府才于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宣布撤销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的贸易，只准夷船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⑥。从此，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广州口岸进行。这就是以往人们认为“标志着全面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代的开始”和“闭关政策的最后形成”，而且认为广州成为独一无二的进出口贸易港口。但是确切地说，广州并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清政府也不是完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因为：

第一，清政府规定海外贸易在当时中国最大的港口广州进行，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只不过是没有全面开放全国的港口而已。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

^① 关于清朝初设四海关的地址，一般史书记载为云台山、宁波、漳州和澳门。今据李士桢《抚粤政略》卷一《议复粤东增豁税饷疏》所记，为“江南驻松江，浙江驻宁波，福建驻泉州，广东驻广州次固镇”。

^②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五年。

^③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四。

^④ 《清朝经世文编》卷八三，第13页。

^⑤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26页。

^⑥ 《军机处上谕档》，见《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统治者，从国家、民族和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根据海外贸易发展的趋势，决定开放多少个港口和开放那些港口，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只要不是关闭所有的贸易港口和完全断绝与外国进行贸易就不能斥之为闭关锁国。

第二，当时所谓的“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主要是对欧美各国而言，特别是英国和荷兰等国。至于南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国家，仍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乾隆二十三年上谕：“如系向来到厦番船，自可照例准其贸易。”^①故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商船，仍然不断到福建厦门等地进行贸易。例如乾隆四十六年、四十八年、五十一年，嘉庆十二年、十四年，西班牙的商人万利落、郎吗叮、郎安敦、郎万雷、郎棉一等，就从吕宋（菲律宾）运载大批燕窝、苏木、番银、槟榔、乌木、呀兰、米、海参、鹿脯、牛皮、玳瑁、火艾棉等到厦门贸易，然后从厦门运回大量的中国棉布、瓷器、桂皮、石条、白纸、花砖、方砖、雨伞、纸墨、石磨、麻线、土茶、冰糖、药材等到吕宋^②，使厦门对外贸易进入极盛时期。

第三，中国商人不受所谓“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之限，可从四海关出海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后，从福建、浙江、江苏沿海港口出海贸易的商船仍是不少。如乾隆二十九年，准“浙、闽各商携带土丝及二蚕湖丝往柔佛诸国贸易”^③。道光九年到新加坡贸易的中国商船共九艘，其中从广州去的一艘，潮州去的两艘，上海去的两艘，厦门去的四艘，共载货 47000 担^④。道光十年从广东的潮州、南康、惠州、徐闻、江门、海南，福建的厦门、青城，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上海、苏州等地驶往日本、菲律宾群岛、苏禄群岛、西里伯群岛、马六甲群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马来西亚半岛、暹罗、安南、柬埔寨等地贸易的中国船只达到 222 艘^⑤。可见，把乾隆二十二年以后主要集中广州贸易视为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标志，是值得商榷的。

清政府不仅开海设关，还实行低税制优待外商贸易。当时对进口商品所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三，第 6 页。

② 道光《厦门志》卷五《船政略·洋船》。

③ 《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七，第 101 页。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1 册，中华书局，1962 年，第 68 页。

⑤ “First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Commons 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China Trade 1830，P629—632.

征的货税是很轻的，大约是货物价值的 1%—2%^①，最多是 6%^②。例如，乾隆十六年英国的一艘船运来毛哔叽 100 匹，只收税银 2.6 两，平均每匹收税银二分六厘。乾隆三十三年的一艘出口船，有二等蚕丝 1224 斤，税银 15.9 两，平均每斤收税银一分多；上等茶叶 5560 斤，收税银 33.36 两，平均每斤六厘；白糖 11800 斤，税银 11.8 两，平均每斤一厘^③。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不断实行减税制度，优待外商，招徕贸易（详后）。

过去，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出发，迫切要扩大中国的市场，不满清政府在海外贸易方面的各种限制，讥讽和攻击清政府的开海设关严格管理海外贸易的政策是“闭关锁国”，企图以此说明当时中国是一个“野蛮、落后、愚昧”的国家，对外商采取排斥态度；进而证明后来西方殖民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多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合理性^④。这完全是违反历史实际的、荒谬的。我国有不少学者也因为清政府曾于乾隆二十二年封闭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而断言清政府是实行闭关锁国的外贸政策，并截用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三日清政府致英王第二道“勅谕”中所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半句话来作证明。其实，全话是这样的：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恩加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⑤

这句话的前半段确实反映了清朝统治者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无所外求的天朝主义思想；但后半段则反映出为照顾西方各国的利益，要在澳门设立洋行同外国进行贸易的恩赐思想。清政府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实行开海设关严格管理海外贸易的政策的。

^①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两广总督耆英、广东巡抚黄思彤奏》。

^② H. B.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l, Chap7.

^③ 转引自韦庆远：《档案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0 页。

^④ 参看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21 页。

^⑤ 梁廷枢：《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二》。

—

正是因为清代前期主要是实行开海设关、严格管理海外贸易的政策，所以整个海外贸易获得不断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主要表现如下：

（一）贸易港口的扩大和贸易国家的增多

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海贸易后，“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①；福建、浙江、江苏沿海也是“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②；山东、河北、辽宁的港口“轻舟”贩运也十分活跃。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大大小小的港口计有一百多处，它们是：

广东的省城大关、东炮台口、西炮台口、佛山口、黄埔口、虎门口、紫坭口、市桥口、镇口口、澳门总口、乌坎总口、神泉口、甲子口、碣石口、汕尾口、长沙口、鲘门口、平海口、稔山口、湖东口、墩头口、庵埠口、双溪口、溪东口、汕头口、潮阳口、后溪口、江门口、海门口、达濠口、澄海口、卡路口、南洋口、府馆口、东陇口、樟林口、黄岗口、乌塘口、北炮台口、梅菉总口、对楼小口、水东口、硇州口、芷芎口、暗铺口、两家滩口、阳江口、海安总口、东西乡口、白沙小口、徐博小口、南樵小口、田头小口、锦囊小口、雷州口、赤坎口、沙老口、乐民口、山口小口、钦州口、海口总口、铺前口、廉州口、青润口、束会口、禹州口、儋州口、北黎口、陆水口、崖州口，共一大关、五大总口及六十四处小口^③。

福建的厦门口、同安口、海澄口、福州口、安镇口、漳州口、泉州口、南台口、青城口、汀州口、台湾口等二十余处^④。

浙江的大关口、古窑口、镇海口、湖头渡、小港口、象山口、乍浦口、头围口（澉浦口）、沥海口、白峤口、海门口、江下埠、温州口、瑞安口、

① 梁廷相：《粤海关志》卷五《口岸一》。

② 雍正《江南通志》卷八六《榷税》。

③ 梁廷相：《粤海关志》卷一〇；档案，《军机录副奏折》卷一六至卷一七。

④ 档案，《户部则例》，《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七日户部尚书科尔坤题》。

平阳口等十五处^①。

江苏的常州口、扬州口、镇江口、刘河口、松江口、施翘河口、黄田澜港口、任家港口、吴淞口、七丫口、白茆口、孟河口、黄家港口、小海口、石庄口、吕四口、徐六淫口、福山口、新开河口、当沙头口等二十处^②。

北方以天津口为盛，其次是山东的登州、辽东的牛庄等港口。由此可知，当时虽然政府规定是广州、泉州、宁波、松江四口通商，但实际上中国整个沿海的大小港口都是开放贸易的。

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撤销了泉州、宁波和松江三海关，开放港口有所减少，但广东沿海各大小港口以及宁波、厦门等港口也仍然准许往南洋贸易，而且就其贸易量而言，还超过了以前（详后）。

如此之多的港口进行海外贸易，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纷至沓来。东洋有日本、朝鲜；南洋有吕宋（菲律宾）群岛、苏禄群岛、西里伯群岛、马六甲群岛、新加坡、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暹罗、琉球、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欧洲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普鲁士、意大利、俄国等国；美洲有美国、秘鲁、墨西哥等国；印度洋有印度等国。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贸易的关系。特别是美国与中国发生直接贸易关系是从乾隆四十九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开始的。而我国宋代与欧、美各国的贸易主要是间接贸易，明代海外贸易则以南洋各国为多。

（二）来往商船的数量不断增加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穿梭往来的中外商船数量逐渐增多。康熙五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有 35 艘，九年增至 36 艘^③。特别是开海贸易后，中国与日本的通商进入了正式缔约贸易时期，到日本贸易的商船大增。康熙二十四年有 85 艘；二十五年 102 艘；二十六年 115 艘；二十七年更增至 193 艘，随船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达 9128 人次^④。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到乾隆

^① 雍正《江南通志》卷八六《榷税》。

^② 雍正《江南通志》卷七九《食货志·关税》。

^③ 大庭修：《日清贸易概观》，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 年第 1 期。

^④ 大庭修：《日清贸易概观》，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 年第 1 期。

二十二年的六十七年间，中国开往日本贸易的商船总数达到 3017 艘^①，平均每年 41.4 艘。商船的吨位也很可观，一般的小船能载重 100 吨，中船可载重 150 吨，大船可载重 250 吨到 300 吨，最大的可载重 600 吨到 1000 吨，而宋代船的载重量为 110 吨左右^②。中国的商船还从事东南亚各国与日本的转口贸易，如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十一年，从广东、南京、宁波、厦门、台湾开往长崎的商船就有六艘是转运咬嚼吧（巴达维亚）等地商品的^③。乾隆二十二年以后，由于日本江户政权进一步实行锁国政策，对中国贸易有所限制，商船数量有所下降，但由于船的吨位增加，贸易吨位总额却是增加了（详后）。

中国与南洋诸国商船来往贸易，在海禁期间，清政府准其在一定时期内来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开海贸易后，来往商船更多。就是在南洋海禁的十年，来往互市的商船也没有绝迹。康熙二十四年，从福州、厦门等地开往雅加达的商船有十余艘。康熙四十二年有五十多艘^④。康熙五十五年“多至千余”^⑤。乾隆以后，到南洋去贸易的商船更多。嘉庆二十五年前后驶往东南亚的帆船共 295 艘，总吨位达 85200 吨。道光十一年，中国到南洋各国贸易的商船达到 275 艘，吨位一般在 120 吨至 900 吨之间，平均为 300 吨^⑥。

欧美各国来中国贸易的商船数量也不断增加。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二年的 72 年中，到中国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 312 艘^⑦，而且船的吨位也不小。例如康熙三十八年至六十一年到广州的英国货船，最小者为 140 吨，最大者达到 480 吨，一般者也达到 300 吨，多数为 410 吨。清政府撤销了闽、浙、江三关后，欧美各国来中国贸易的商船仍然

① 据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下册，第 327—334 页所列数字统计，商务印书馆，1931 年。

② 郑学檬等：《简明中国经济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216 页。

③ 《唐船进港回棹录》，转引自《辽宁大学学术论文选编》，1983 年，第 168 页。

④ 杨余练：《试论康熙从“开禁”到“海禁”的政策演变》，《光明日报》1981 年 1 月 13 日。

⑤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〇。

⑥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1 册，中华书局，1962 年，第 63 页。

⑦ 根据梁廷枢《粤海关志》卷二四；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附录》及吕坚：《谈康熙时期与西欧的贸易》（载《历史档案》1981 年第 4 期）所提供的数字统计。

不断增加。据统计，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到粤海关贸易的商船共^①5107艘^②，平均每年为63.8艘。其中，以英国的商船最多，乾隆五十四年为58艘，占外商船总数的67%；道光六年为85艘，占外商船总数的82%；道光十三年为107艘，占外商船数的80%^②。

（三）进出口商品数量繁多

清代前期，中国海外贸易的进出口货物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是空前的，请看当时出口和进口的商品状况。

第一，出口商品的种类及数量。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当时整个生产水平较高。在海外贸易中，中国货物大量出口。当时输往日本的商品有：

江苏的书籍、白丝、绫子、绉绸、绫纨、罗纱、闪缎、南京绡、锦、金缎、五丝、柳条、绢绸、棉布、丝棉、皮棉布、丝线、纸、信纸、墨、笔、扇子、砚石、茶、茶瓶、瓷器、铸器、锡器、漆器、明矾、绿矾、红豆、药材、绘画等。

福建的书籍、墨迹、绘画、墨、纸、布、葛布、白丝、绫子、绉、纱、纱绫、八丝、五丝、柳条、绫纨、纱、紵罗捻、绒绸、绢绸、闪缎、天鹅绒、丝线、棉布、绫条布、砂糖、甘蔗、佛手柑、橄榄、龙眼、荔枝、天门冬、明矾、绿矾、花文石、鹿角菜、紫菜、牛筋、天蚕丝、瓷器、美人蕉、线香、铸器、漆器、古董、扇子、栉蓖、针、蜡、降真香、藕粉、鱼胶、丝棉、茶、茴香、蜜饯、花生、药物、生活用品等。

广东的白丝、黄丝、锦、金缎、二彩、五丝、七丝、八丝、天鹅绒、闪缎、锁服、柳条、绫子、绉绸、纱绫、绢绸、纪、紬、绸、漆器、陶器、铜器、锡器、马口铁、针、眼镜、龙眼、荔枝、沉香、乌木、木棉、玳瑁、槟榔子、龙脑、麝香、真珠英石、漆、椰子、菠萝蜜、蚺蛇胆、水银、锅、天蚕丝、端砚、车渠（石）、花黎木、藤、翡翠鸟、鹦鹉、五色雀、碧鸡孔雀、药种、蜡药等。

^① 根据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四《市舶》的数字统计。

^②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四；张天护：《清代法国对华贸易问题之研究》，《外交月报》第8卷第6期。